# 权力感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程柏然、黄帅

（中南民族大学应用心理学系）

**摘 要** 权力是个体影响他人以及能够不被他人所影响的能力，而权力感正是个体对于着一能力的主观感知。人们普遍认为，与低权力者相比，高权力者更为自我中心，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也会相应较低；但也有研究者发现，有些高权利个体也会建立更多的社会责任目标，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基于上述现象，本文探究了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311名被试数据。得到的结果表明：个体权力感能够正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而在其预测路径当中，个体社会公正信念起完全中介作用。即权力感高的个体更愿意从事亲社会行为。本文对理解权力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丰富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有理论贡献，对有效引导高权力感者投身亲社会行为具有实践价值。

## 一、问题的提出

权力（power）是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最开始的时候，心理学家认为权力是一种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事实而能够存在的结构变量（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例如在你争取拿到学分的时候，一些和陈平、沈逸、张维为之辈同样来自复旦的毛概老师对于你来说就是具有高权力的人。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进行，研究者们发现，权力感其实也可以作为个体脑中概念被特定方式启动（Chen, Lee-Chai, & Bargh, 2001），即权力可以是一种心理变量。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个体并不是真正具有高权力的社会角色，也可以通过特定方式激活其内部的权力概念和相关的行为倾向性（e.g., Rucker, Galinsky, & Dubois, 2012）。有心理学者认为，权力即是一种影响他人和对资源等有价值物分配进行控制的能力（(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0; Fast et al., 2011; Galinsky et al., 2003; Maner, Gailliot, Menzel, & Kunstman, 2012），也是一种个体能够掌控自身，不被他人影响的能力（Overbeck & Park, 2001）。而对于权力感的定义，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个体的一种涵盖长期知觉和短期状态，对于权力拥有或缺失的心理表征（Keltner，Gruenfeld & Anderson，2003；靳菲，涂平，2018）。而作为心理变量的权力感，研究者们既可以通过在实验中以角色扮演或者情境启动来激活个体的权力感（孙倩、龙长权等，2019），也可以通过一些心理量表，如《一般权力感量表》（Generalized Sense of Power Scale; Anderson & Galinsky, 2006）来对个体权力感进行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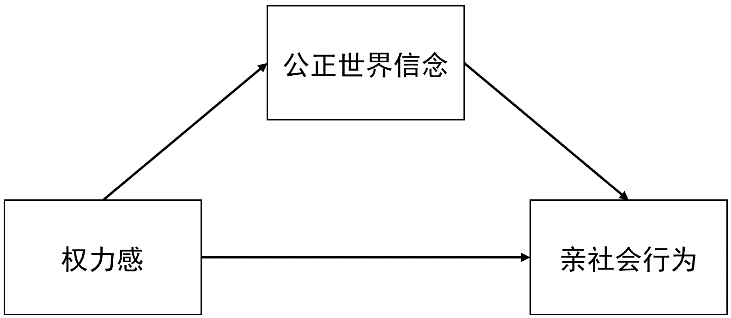
亲社会行为，一般可以体现为与他人资源的共享，被认为是一种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有利于社会和他人存在和发展的个体行为（段锦云，国轩，2018），亲社会行为能够和谐化个体的人际关系（寇彧, 付艳, 张庆鹏, 2007）。而目前对于亲社会行为的测量，目前采用较多的则是亲社会行为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PTM；Gustavo，Brandy，2002），国内也有研究者以此为基础，新编制成了本土化的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寇彧,洪慧芳,谭晨等，2007）。

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指出，人脑中存在行为接近和抑制系统,它们影响个体的注意、情感、社会认知及行为，高权力激活行为接近系统,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驱动个体进行自动化的认知加工，预期自我身边充满奖励而缺乏威胁,表现出更多目标寻求行为（Guinote, 2017;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这一理论认为，因为权力的突出特征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平等控制，那么权力水平的提高会伴随着人的自利偏好，比如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便发现具有高权力的个体更倾向于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奖励（奖金）（Greenberg, 1978）。而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可以体现为和他人共享利益的行为，伴随个体权力感的不同会有何变化呢？

在早期研究中，一些学者便认为，伴随着较高的权力水平，个体的自利倾向必然增加，相应的其亲社会行为也必然会受到抑制（Kipnis & Cosentino, 1969；Kipnis, 1972）。然而，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事实似乎并非总是如此，比如对于一些本身就具有亲社会特质的个体，较高的权力水平可能会促进其亲社会行为（de Vries, 2012）。不仅如此，更有学者提出，权力水平的不同并非带来个体特质的改变，而是带来对个体固有特质的“增幅”（Galinsky, Rus, & Lammers, 2011）。在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研究者便发现，高权力者更倾向于做出趋向公平的分配方案（Li, Xu, & Wang,2018）.总而言之，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们对于权力感对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着诸多不一致的发现，本文正致力于探究这其中的可能性部分因素。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诸多学者在上文中的不一致？正如上文所言，权力的一大特征就是涉及到了对资源控制的不对称性，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就涉及到了资源分配的原因，而对于具体的资源分配，目前研究有人发现，这关乎于个体对于公平和利益两个维度的追求，即人既具有对于追求公平的偏好（Thaler, 1988），但也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利己偏好（(吕小 康, 武迪, 隋晓阳, 等, 2018）。因而在进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个体必然要陷入一种对利益和公平的思考和权衡之中，这也就决定了一个事实——个体对于利益和公平的思考和权衡也就决定了其在亲社会行为上的倾向以及最终表现（Boksem & De Cremer, 2010; Brosnan & de Waal, 2014）。这个个体内部的决策过程也就要受到其公平感的影响。在更为一般性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有关公平的总的看法正是世界公正信念，这是社会成员关于社会事实是否会“所得应得、所得即应得”的信念（Lerner， 1965），它可以分为有关个体对个人处境公正性的看法和关于总体世界现实公正性的看法，即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以及一般世界公正信念（Dalbert，1999; Lipkus，Dalbert，＆ Siegler， 1996）。有研究者便发现，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姬旺华，张兰鸽，寇彧，2014）。而在本文中，我们旨在探讨更加一般的权力感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路径机制，那么我们将要考虑纳入世界公正信念这一变量在权力感——亲社会行为路径中的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1.个体权力感能够正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H2.个体权力感可以预测其公正世界信念。H3.公正世界信念可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模型1**

## 二、研究方法

### 2.1.被试

通过问卷星程序进行线上发布、征集被试填写完成量表初测。初测进行时间为14天。而对于量表初测，本小组回收问卷31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11份。在本小组回收的有效样本中，男性164人，占比53.6%；女性142人，占比45.7%。多数被试年龄处于18岁到45岁区间（286人，占比92.00%）。其中少数民族116人，占比37.3%；汉族195人，占比62.7%。多数被试文化水平为本科或专科（228人，占比73.3%）。多数被试来自于城镇（237人，占比76。2%），来自乡村的被试为74人，占比23.8%。

### 2.2.研究工具以及材料

（1）个体权力感

由中南民族大学研究者编制的SCUN个体权力感量表，以权力接近-抑制理论为基础，具有“环境威胁”、“情绪体验”、“行为去抑制性”以及“关注及同理心”四个维度，其包含题目“我认为自己的身边的人都对我没有敌意”、“朋友的家庭状况跟我一点也没关系，我才不会去管那些。”等。该量表采用7点式计分方式，从1 到7分别代表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8，内部一致性良好。

（2）公正世界信念

改编自Dalbert(1999)编制的公正信念量表（Just World Belief Scale），该量表包含个人公正世界信念（7个项目）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6个项目）。其中题目包括“总的来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应得的”、“我认为世界基本上是公正的”等。量表采用6点计分方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为1到6分。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3。内部一致性良好。

（3）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亲社会行为问卷翻译并改编自Carlo等人（2002）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量表（PTM）。该量表包括“我认为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是最好的”等题目，该量表采用7点式计分方式，从1 到7分别代表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6。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 三.、权力感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施测过程中强调匿名性，部分项目反向计分等措施进行事前程序控制。数据回收后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21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6.53%，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 3.2.描述及相关分析

权力感、公正世界信念、亲社会行为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见表 1。权力感、公正世界信念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即被试权力感水平越高，公正世界信念越强，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权力感和公正世界信念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 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 1 权力感 | 79.52 | 17.08 | 1 |  |  |
| 2 公正世界信念 | 45.00 | 8.65 | 0.42**\*\*** | 1 |  |
| 3 亲社会行为 | 114.26 | 21.86 | 0.34**\*\*** | 0.69**\*\*** | 1 |

注：\*p<.05，\*\*p<.01，\*\*\*p<.001，下同。

### 3.3.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Muller等（2005）、Lacobucci（2012）与方杰等（2017）的观点，采用Hayes（2013）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Bootstrap 取样为5000），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条件下，以权力感为预测变量，公正世界信念为中介变量，亲社会行为为结果变量构建的中介模型，即模型1。

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权力感对公正世界信念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0.24,p<0.05,95%CI=[0.19,0.29]）。当权力感和公正世界信念都进入回归模型时，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8，p>0.05,95%CI=[-0.04，0.20]），而公正世界信念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亲社会行为（B=4.27，p<0.05，95%CI=[1.41，1.89]），且中介效应量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见表3，Boot95%CI=[0.26，0.50]）。因此，公正世界信念在权力感和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

表2：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归方程 | |  | 整体拟合指数 | | |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 R | R2 | F |  | B | β | t |
| 公正世界信念 | 性别 |  | 0.49 | 0.24 | 32.63\*\*\* |  | 4.27 | 0.25 | 4.82\* |
|  | 年龄 |  |  |  |  |  | 1.88 | 0.07 | 1.43 |
|  | 权力感 |  |  |  |  |  | 0.24 | 0.47 | 9.08\* |
| 亲社会行为 | 性别 |  | 0.69 | 0.48 | 69.69\*\*\* |  | 1.19 | 0.03 | 0.62 |
|  | 年龄 |  |  |  |  |  | 2.25 | 0.03 | 0.81 |
|  | 权力感 |  |  |  |  |  | 0.08 | 0.06 | 1.30 |
|  | 公正世界信念 |  |  |  |  |  | 1.64 | 0.65 | 13.73\* |

表3：公正世界信念中介效应分解表

|  |  |  |  |
| --- | --- | --- | --- |
| 公正世界信念中介效应分解表 | | | |
|  |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95CI% |
| 直接效应 | 0.08 | 0.62 | [-0.04，0.20] |
| 中介效应 | 0.39 | 0.06 | [0.26，0.50] |

### 3.4.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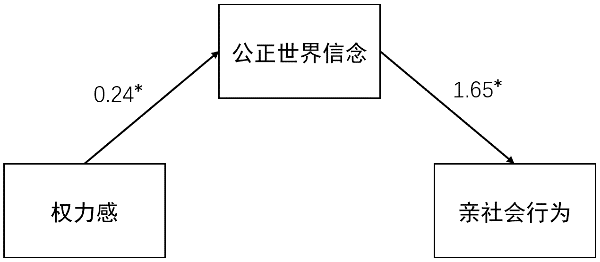
经过统计检验，我们发现个体权力感能够正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假设1得到证实；同时个体权力感也能够正向预测公正世界信念，后者对于个体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本研究的假设2、假设3得到证实。同时需要注意假设1中所说的个体权力感对其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其实是完全通过权力感对其公正世界信念的正向预测效应实现的，换言之，总体来看公正世界信念在权力感预测亲社会行为的路径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图2. 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预测路径

## 四、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个体权力感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实现对其亲社会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证实了De Cremer 等人（2008）的研究，即伴随着权力感水平的提高，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根据Galinsky等人（2011）的观点，权力本身可能并不会改变个体本身固有的特质，而是对个体特质的“增幅”。对于本次研究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本身所具有的亲社会特质的表达有了更多的社会环境土壤，其亲社会特质有了更广阔的表达和落实至行动上的空间，因而这时权力感水平的提高正向预测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法治建设也随之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对于自身和社会有了更高的预期，表现为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提高，法治建设是个体行动的一大重要保障，因而基于对于法的信赖——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在其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虽然本文在一定角度上得出了上文结论，然而，根据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situated focus theory of power），权力水平的提升会使个体做出与其目标更为一致的行为，这种行为根据情境不同可以表现出一定灵活性（Guinote，2007），也有学者证实了这一观点（周静,杨莹,周天爽等，2021）。然而在本研究中并没有过多探讨情境因素对权力感-亲社会行为的预测路径中的更详细效应，这有待后来者对之进行更多的完善。

其次，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社会阶层会影响个体追求目标的过程（胡小勇,郭永玉,李静,等，2016）：相对于高阶层者，低社会阶层者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将个体行为总是看作追求目标的过程（不停实现需求、满足动机的过程），那么这一现象是否能够推广到本研究完全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呢？如果加入社会阶层因素，是否能够更加全面的探究权力-亲社会行为的预测路径机制呢？这一设想仍需本小组成员后续的探索。

同时，本次研究对于数据的处理仅仅停留在各个量表在总分上的关系和预测机制上，而没有进一步从不同量表维度上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和深究。虽然从量表总体得分的水平上本次研究仍可以得到一个整体水平的路径模型，但是缺少更多的细节与具体路径机制，这个现象受限于小组成员的统计技巧，亦期望后续研究的补充。

另外，作为一次调查问卷的研究，本研究最终回收了有效被试样本311份，远少于主流研究一般所采用的被试样本量，这在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会对结果造成可能性的偏差，同时多数被试为高校在校学生，因此本次研究的发现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群体。同样的问题，大多数被试来自于城镇，缺少家庭所在地来自乡村者。这也是本次研究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参 考 文 献**

Anderson, C., & Galinsky, A. D. (2006). 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4), 511–536.

Boksem, M. A. S., & De Cremer, D. (2010). Fairness concerns predict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amplitude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Social Neuroscience, 5(1), 118–128.

Brosnan, S. F., & de Waal, F. B. (2014). Evolution of responses to (un) fairness. Science, 346(6207), 1251776.

蔡頠,吴嵩,寇彧.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相关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01):120-131.

Chen, S., Lee-Chai, A.Y., & Bargh, J.A. (2001).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as a moderator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2), 173–187.

Claudia Dalbert.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s a Buffer Against Anger[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02,15(2).

Dalbert，C． ( 1999 ) ．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2 ( 2) ，79 － 98．

De Cremer, D., & van Dijk, E. (2008). Leader—follower effects in resource dilemmas: The roles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1(3), 355-369.

de Vries, R. E. (2012). Personality predictors of leadership styles and the self–other agreement problem.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3, 809–821.

杜建政,祝振兵.公正世界信念:概念、测量、及研究热点[J].心理科学进展,2007(02):373-378.段锦云，国轩，田晓明.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死亡凸显和权力感对助人行为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2018（02）.

Dubois, D., Rucker, D.D., & Galinsky, A.D. (2010). The accentuation bias: Money literally looms larger (and sometimes smaller) to the powerles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 199–205.

Fast, N. J., Sivanathan, N., Mayer, N. D., & Galinsky, A. D. (2011). 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7(2), 249–260.

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 Magee, J. C. (2003). From power to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3), 453–466.

Galinsky, A. D., Magee, J. C., Gruenfeld, D. H., Whitson, J. A., & Liljenquist, K. A. (2008). Power reduces the press of the situation: Implications for creativity, conformity, and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450–1466.

Galinsky, A. D., Rus, D., & Lammers, J. (2011). Power: A central force governing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life. In D. de Cremer, R. van Dick, & J. K. Murnighan (Eds.), Soci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s(pp. 17–38). New York, NY: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Greenberg, J. (1978). Effects of reward value and retaliative power on allocation decisions: Justice, generosity, or gre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367–379.

Guinote, A. (2017). How power affects people: activating, wanting, and goal see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Guinote, A. (2007). Behaviour variability and the situated focus theory of power.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8(1), 256-295.

Gustavo Carlo, Brandy A R.Are all prosocial behavior equal? Asocioecologi cal developmental concept of prosocial behavior.In:F.Clumbus.Advance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New York:Nova S cience, 2001, ( 2) :151-170.

Gustavo Carlo,Brandy A. Randall.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Behaviors for Lat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 2002 (1).

Gustavo Carlo. Socio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a Measure of Prosocial Tendencies for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2003,23(1).

胡小勇,郭永玉,李静,杨沈龙.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J].心理学报,2016,48(03):271-289.

姬旺华,张兰鸽,寇彧.公正世界信念对大学生助人意愿的影响:责任归因和帮助代价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05):496-503.DOI: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4.05.019.

靳菲，涂平.受助者群体身份调节权力感对捐赠的影响[J].管理学报，2018（11）.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Kipnis, D., & Cosentino, J. (1969). Use of leadership powers in industr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3, 460–466.

Kipnis, D. (1972). Does power corru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4, 33–41.

寇彧, 付艳, 张庆鹏. (2007). 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 一项焦点群体访谈研究. 社会学研究, (3), 154–173.

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01):112-117.

Lerner，M． J． ( 1965 ) ．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s a function ofperformer’s reward and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 ( 4) ,355-360．

Li, O., Xu, F. M., & Wang, L. (2018).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oes not always exist: the role of determining allocations modulates preferences for advantageous inequ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749.

Lipkus, I., Dalbert, C., ＆ Siegler, I.( 1996 ) ． The importance ofdistinguish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self versus for others: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22 ( 7) ,666 － 677．

吕小康, 武迪, 隋晓阳, 汪新建, 程婕婷. (2018).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 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249–2259.

Maner, J. K., Gailliot, M. T., Menzel, A. J., & Kunstman, J. W. (2012). Dispositional anxiety blocks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ow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1), 1383–1395.

Overbeck, J. R., & Park, B. (2001). When power does not corrupt: Superior individuation processes among powerful percei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4), 549–565.

Rucker, D. D., Galinsky, A. D., & Dubois, D. (2012). Power and consumer behavior: How power shapes who and what consumers value.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2(3), 352–368.

孙倩、龙长权、王修欣、刘永芳（2019）公平或是利益？权力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心理学报

Thaler, R. H. (1988). Anomalies: the ultimatum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 195–206.

周静,杨莹,周天爽,孙兰,崔丽娟.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自我获益的中介和情境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21,44(02):370-376.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10216.